



## 艾約翰教授講辭

莫禮時校長、香港教育學院各位教職員、各位嘉賓、各位女士和先生：

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首次到訪香港，出席中學主任教師協會舉辦的二十五週年紀念研討會，研討的課題是「校本課程發展」。當時我獲大會邀請作主題講者，我選擇了「課程發展作為行動研究的過程」為講題。發言期間，聽眾對講辭的內容並沒有多大興趣。研討會完畢，也很少人找我討論發言的內容。然而在餘下的行程裏，我得到非常殷勤有禮的款待。

就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前，我參與發展香港一項簇新的博士研究生課程；該課程由我所屬的大學參與開發，以應用教育研究為主題。由於錄取的學生很多是剛成立的香港教育學院的教職員，所以我也常常到訪這個美麗的校園。藉着博士研究生課程提供的機會，我和東盎格利亞大學的同事，以及由我們督導的教院博士生遂着手探索是否可以把他們撰寫論文用的研究，與香港教育制度的發展結合起來。從他們的研究中，我深深體會到這種行動研究對改變香港教育制度的潛力。那是我參加研討會接近十年之後，香港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回歸後的課程改革還未面世，一些校長、教師和師資教育工作者卻似乎已經準備就緒，迎接改變。根據莫禮時教授的分析，這種敢於改革的態度其實源自前殖民地政府以前試行的系統層面改革。雖然「目標為本課程」現在普遍被視為失敗，但莫禮時教授卻認為它改變了公眾對校長和教師這些角色的期望，讓回歸後的課程改革乘勢而起，賦予教師和師資教育工作者質疑固有教學條件和環境的機會。這些改革為建造嶄新的教師專業文化，以及把理論和實踐重新結合提供了極佳的基調。

一九九九年，本人有幸接獲許美德教授的邀請，擔任香港教育學院的顧問教授，並受聘於教育基礎學院。過去三年，每次我來到教院，教育基礎學院的院長李榮安教授及其繼任人顧思滿教授，總是將我的行程安排得緊湊充實。除了要在無數的研討會上向教院教職員發表講話外，還為始創期間的教院提供各種與其發展有關的諮詢服務。當我在教院工作的初期，課程發展處的陳嘉琪博士也給我一些任務，兩方面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

香港充滿創意的新課程綱要，與英國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發展的模式不大相同。後者是一套針對考試、以學科為本和高度規範的模式；目的是從社會工程學的角度建構和操控被認為能為勞工市場帶來經濟商品利益的學習成果。雖然香港的課程綱要也有英國那一套的成份，但是它與後者也有很大差別。它認定了要為不同才智的學生創造公平的環境，也沒有對學習成果重此輕彼的核心課程。香港的課程綱要看來是在說：「讓我們保證香港的教育制度能培養出各式各樣的人才，使香港社會能以源源創意回應經濟狀況的轉變，因為後者往往是突如其來的。」這是一次極具歷史意義的改變，把教育與經濟的關係從社會工程學的模式，轉移到一如我的同僚麥克唐納所形容的達爾文模式，即所謂「適者生存」。

香港的課程綱要也清楚表明一套核心的社會價值，這套價值貫串整套課程，以造就個人多元發展。這再次說明了這綱要擁有創新的理念，避免了英國及其他西方市場經濟對課程添加制肘的傾向，例如加入「公民教育」，不外乎顯示當局憂慮社會融合受到侵蝕而作出的驚惶反應。

最後一提，香港的課程綱要給予教師在校內推行創意課程和教學法實驗的空間，似乎對教師寄予較大的信任。在重點學習範圍內，教師可以自由測試各種結合和組織教學課題的新方法，使學生投入一個更主動、更創新、更懂得批判和更注重群體的學習過程，並且開發一些評核方法，鼓勵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負上更大責任。這課程綱領把教師塑造成研究者的角色，探索如何將教育理想付諸實踐。正因如此，它也為香港的師資教育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馬頓教授認為，就目前的定位而言，香港勢將在二零一零年之前成為全球教學法的重鎮，本人也很認同這種樂觀的看法。香港教育學院得到莫禮時教授的領導，並在許美德教授奠定的成就上繼續發展，確可望在這方面擔任重要角色，促使香港成為全球教學法的重鎮。要達到這個目標，香港教育學院將需加強師資培訓與實際教學，以及師訓模式與教育研究之間的聯繫。行動研究既然強調建立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新關係，便可望容許師資教育工作者繼續保持以往專業教師的身份，同時又兼任教育研究者的角色，並在兩者之間取得協調。在綜合型大學裏，師資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含糊，身份割裂；皆因一方面有人主張教育研究應該受普通學科規範，但另一方面這些學者卻要在複雜的專業環境下實踐教育行動。設立一所純粹為培訓教師而設的高等學府，其好處之一是可以確立一個比時下眾多綜合型大學更優勝的遠景，從而避免角色含糊的情況出現；這個遠景將展示出運用專業知識支援學校教育變革的方法。本人深信香港教育學院的優勢，在於它具備創造這種遠景的能力，從而證明這類型的高等學府，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貢獻，為教師和教師教育工作者孕育出嶄新的專業文化。

過去幾年，我不斷反思目前改革背後的教育理想，到底源自何方。大家不難看到，催生這種理想的西方教育思潮，是林林總總改革概念的源頭，但我們不應將之理解為一種簡單直接的文化轉移。我漸漸發覺不少在正在施行的教育改革，都以孔子的學說為論據：包括對教與學的理解，知識與行動的關係及個人培育等。我也發現「知識隨著社會變化，知識必須透過行動證實」等所謂後現代概念，早已在孔子的學說中出現。孔子也曾明確指出，真正的教學會將教師塑造成學習者的角色；而注重「過程」的課程發展模式，也會比注重目標的模式更能切合教育的需要。以為西方教育理論是上述觀點的唯一源頭，是個錯誤的假設。即使把「視教學為一種研究方式」和「教師同時也是研究員」這些觀點以孔子的學說詮釋，也會呈現全新的意義。

觀乎香港，套用馬頓教授的描述，人們正在重新發掘和認真鑑定這些埋藏在「世上最古老的教學文化」內的思想和觀念；這種文化在香港與西方的教育思想交接，使此地能發展出一套在改革的潮流中處於領導地位的教育理想。能在此時此地接受這個榮譽博士學位，實在使本人引以自豪。



## 許美德教授講辭

莫禮時校長、香港教育學院各位教職員、各位嘉賓、各位女士和先生：

對香港教育學院來說，今天是個既難得、又特別的盛會。今天不僅是教院首屆四年制教育(小學)學士畢業的喜慶日子，也是創香港先河的幼兒教育學士課程的第一屆畢業典禮。本人今天能夠出席，並接受香港教育學院頒授的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實在深感殊榮。

首先，本人想以一個問題開展話題：「教育學士到底有何特別之處？」作為一個國際認可的大學學位，教育學士就是一個既注重鑽研如數學、中文或社會等個別科目的高水平專門知識、同時亦兼重諸如教育心理學及課程學等專業培訓的課程。回顧香港的教育史，小學教師大多只能接受證書課程的培訓，資歷亦只獲本地承認。隨著知識型社會的降臨，以及愈來愈多人意識到基礎教育對社會健康成長的重要性，社會大眾終於認同從事基礎教育的教師功不可抹，而且應該由持有大學學位、具專業資格的人士擔任。

自從大學在中古時代的歐洲建立以來，「學士學位」一詞便與大學連在一起。中國傳統社會也會為受過高深教育的學者冠以學歷稱號，最高級別的稱之為「進士」。在歐洲的大學裏，取得大學資歷的人不單在其所屬的地區獲得承認，更可獲教廷頒發特許狀，也就等同獲得國際認可。在東亞地區，中國的士人則享有崇高的地位。故此，香港現在趨向由持大學學位的人士擔任小學和幼稚園教師，便給予教育學士一個全新的定位。他們的學術水平與全世界的大學畢業生是一致的；而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則足以讓他們辨識和發揮香港每位莘莘學子的潛能。

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台灣和歐洲大部份地方的小學教師，也是經歷多年才能提升至這個資歷。因此我們很高興見到香港教育學院在提升本地小學和幼稚園教師的地位和素質方面，開拓了這麼重要的路向。這種轉變也正好為中國內地未來的師範教育鋪路。近年來，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也新設了專門培訓小學教師的教育學士課程。

今年六月，本人在一次美妙的機會中碰到大約十二位應屆教育學士畢業生。我問他們在四年學位課程中甚麼經驗最為難忘。其中幾位告訴我，最感興奮的莫過於能夠培養出一種反省一己所學的能力。他們理解到上課不僅是牢記和學習授課技巧，而是從批判角度全面地思考如何把數學或歷史等方面的知識，應用在日後教育學童方面。

其他畢業生則告訴我：前往英國、加拿大、澳洲和中國東北，參加語文沉浸學習，是教育學士課程中最刺激的部份。這些經歷讓他們接觸不同的社會，目睹不同類型的教學部署和學習方法，感受不同的文化，擴闊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更勇於創新，在香港的教室裏嘗試種種新穎和不同的教學形式。

另一些畢業生告訴我關於他們在本港接待外國訪客的經歷。其中一位提到在國際奧林匹克數學大賽舉行期間，如何充當導遊，領導一群來自菲律賓的年輕老師，參觀教院校園和到四處遊覽的興奮經驗。

還有一位學生說，最充實的經驗是舉辦藝術作品展覽，把同學們在教院數年的心血結晶公開展出。

能夠在這些學生即將為人師表的時刻與他們共聚，分享他們最難忘的經歷，使我感到很欣慰。但是更大的喜悅卻是能夠在此時此刻與你們一起，慶祝你們重大的成就——成為第一支完成四年制教育學士(小學)和教育學士(幼兒教育)的生力軍。

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份忠告和一個激勵人心的故事。這份忠告來自香港一位資深婦女領袖。這位女士先後在多個行業中建立了傑出的事業：她是教師、律師、銀行家，也是大專學界的領袖。她告訴我說：人不能計劃自己的生命，但每當機遇降臨，必須抱著開放的態度，「以熱情擁抱生命」。無論所做何事，必須全心全意，克盡所能。說到這裏，相信各位都可能已經猜到這份忠告來自哪位知名人士：她就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主席林李翹如博士。

現在讓我個說故事：這故事來自中國內地，是真人真事。主人翁是位女士，我在一九九三年有幸與她遇上，在二零零一年又與她重逢。她的洋名叫瑪嘉烈，廣東人，家裡說英語，自小在上海長大。一九五七年，她十六歲，剛中學畢業，卻和一批年青人一起被分配到偏遠的大西北。這表面上是配合中國開發邊疆地區的革命行動，但也是對一些「出身不好」的青人的一種懲罰。

經過三十天顛簸折騰的貨車旅程後，她終於抵達了遠在幾千里外的西北城市烏魯木齊，並且在當地的工廠找到了工作。她在工廠裏遇上了她的丈夫，還結了婚。後來工廠關閉，兩人便從烏魯木齊搬到數小時火車車程以外一個名叫阿勒泰的北部荒僻城鎮。她的丈夫在當地油田工作，而她則在家中照顧兩個孩子。當孩子長大後，她便渴望能回饋社會，於是她向當地的中學提出，希望以她自幼學習的英語，教授當地的學生。當地的中學很勉強地給了她一點兼職的教學工作，但她卻愈來愈喜歡她的學生，而且很努力地學習教學和備課。然而，校方對她的英語水平和教學能力毫不了解，也沒有重視她的工作，往往令她覺得很泄氣。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上台，宣佈要把中國的教育向全球開放。瑪嘉烈認定她貢獻社會的願望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出路。於是她給位於烏魯木齊的新疆大學外語系主任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她的英語流暢，而且願意以教好英語來幫助中國對外開放。當那位系主任接到這封從偏遠小鎮阿勒泰寄來的信時，感到很驚訝，很難相信在那樣的地區會有英文程度那麼高的人居住。他給瑪嘉烈發了一封電報，請她馬上去見他。瑪嘉烈買了一張到烏魯木齊的長途火車票，系主任與她見面後，當下就聘任她為英語講師。此後多年，瑪嘉烈非常努力地教學和進修，並相繼獲升任為副教授及教授。她集中教導那些需要應付美國托福試、準備到英語國家進修和從事研究的大學學者。時至今日，人們都認為她藉着開辦英語班協助當地大學對外開放，是他們的大功臣！這是個多麼美妙的事例啊！一個人衝破了重重的困阻，用熱情來擁抱生命！我上一次遇到她是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她正在興奮地期待香港一個高層代表團到當地訪問。由於她為開發大西北立下大功，當地的領導人都邀請她協助接待代表團，而她更是區內少數能講流利英語、廣東話和普通話的人。

我希望大家喜歡我剛才說的真實故事，也希望你們能夠全心全意栽培你們教導的孩子和年青人，更希望你們能夠「以熱情擁抱生命」！